

农村“五风”问题史料剖析

李建中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南阳 473004;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由于将公社作为唯一的核算单位,致使农村的“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并破坏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对农村“五风”问题的史料进行剖析,旨在以史为鉴,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方向。

关键词 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平二调“五风”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2)02-01252-03

1 农村“五风”兴起的原因

1.1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很快就能实现,而人民公社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这导致全国各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全国所有的公社都以公社作为唯一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全社范围内采取全民所有制,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都归公社集体所有,在全社范围内统一使用、统一调拨;农副业生产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个人消费资料实行全社统一分配;大部分公社甚至将社员个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工具、家具、厨具、房屋、衣被和钱款等也收归公社所有。很明显,公社干部认为整个公社的人、财、物都归他们管理,所以他们拥有处置权。因此,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必然引起“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人民公社内部以生产要素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是农村“五风”盛行的制度性根源。

1.2 农村工作方向出现偏差 大跃进期间,我国农村工作的方向出现偏差,工作重点不是以正常的农业生产为主,而是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搞以集体养猪为主的副业生产,大办初、高中教育,大办地方工业,大修小铁路、小公路,大伐木,大采集,大改耕作制度,大采矿等。这些“大搞”、“大办”的举措,极大地分散、浪费了劳动力、物资和金钱,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田间管理工作,同时这些“大办”绝大部分投入多、产出少,得不偿失。尤为严重的是,“大办”成了各级干

部大刮“五风”的名正言顺的借口。公社要炼钢铁,干部们就冠冕堂皇地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动力、工具和钱款等,有些地方为了炼钢,将社员的铁锅、铁锁都拿去炼钢了;公社要办一所初中和高中,干部们就无偿征用生产队的耕地,调拨生产队的桌椅板凳;县里要建万头猪场,要建商品蔬菜生产基地,就无偿占用生产队的土地,无偿调拨社员私人的生猪等。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大办”与“五风”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只要一搞‘大办’,农村马上就刮‘五风’,‘大办’不止,‘五风’不停。‘大办’过程中一旦缺钱缺物缺人力,马上就刮‘共产风’,把下面生产队和社员的人财物‘一平二调’上来,随便把别人的东西抓过来,归自己所有,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县、公社、大队以及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刮过来的钱财,不是全部投资于‘大办’,而是有一部分被干部贪污浪费了”。

2 农村“五风”的表现

2.1 “共产风” “共产风”是农村“五风”的核心内容,其主要表现是“一平二调”。所谓“平”,就是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所谓“调”,就是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或者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共产风”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可以说是无偿占有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动成果。刮“共产风”不是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的个别现象,而是刮遍全国。正如前面毛主席所说,中央支持各地“大办”这,“大办”那,虽然没有直接号召大家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际上纵容了“共产风”的兴起。因此在刮“共产风”和采取“大办”举措方面,责任人人有份,中央、省、地、县、公社、大队和小队都有责任,甚至社员也有责任。刘少奇1961年5月在其家乡炭子冲调查研究时,亲眼目睹了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共产风”,他说“现在社员随便拿东西,稻谷、小菜,随便就拿走了,红薯种上就被人拿走了,搞不成器……个人的东西被随便拿走,公家的东西被社员随便拿走,这就动摇了所有制。所有制不确定,就没有办法安心生产。……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2]。

全国各地刮“共产风”的情况不断反映到党中央,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天,即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讲到,“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

作者简介 李建中(1970-)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从事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E-mail:lijianzhong1973@sina.com。

收稿日期 2011-10-17

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1]。他严厉批评了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要求各地迅速纠正,但是各地“共产风”屡禁不止。如湖北省沔阳县在党中央1960年11月3日发出“十二条”,要求纠正“五风”以后,还在刮“共产风”,该县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所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打乱了。生产队的土地被圈占,物资、资金、劳力被调走,加上干部瞎指挥,底子越搞越空,群众说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上边刮,下边也跟着刮,公私、你我都分不清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1]。上面谈的只是“共产风”在生产要素无偿调拨方面的表现,在社员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共产风”则突出表现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实行免费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很多公社,今年(1958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1]。

2.2 “生产瞎指挥风” 前面所说的这“大办”、那“大搞”,可看作是农村工作中全局性的瞎指挥。在具体的农业生产方面,全国各地都由公社统一指挥生产劳动,大队、小队干部则成了公社干部的传话筒,成了机器人。如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电气化’就是靠电话。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在同一块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这就是全公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日。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1960)有,今年也有的事实”^[1]。广大群众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讽刺“生产瞎指挥风”,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稀奇稀奇真稀奇,哪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1]。这几则史料令人啼笑皆非,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分散性很强,播种、收获等方面,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不可能由全公社统一指挥;且如此对农业生产进行瞎指挥,必然导致粮食及其他作物大大减产,造成农民及全国人民缺粮少衣,猪、禽、蛋等副食品紧张的困难局面。

2.3 “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全国都搞浮夸,各行各业都乱

放“卫星”,看谁的口号喊得高,比谁的调子唱得响,各级干部习惯于说假话,不敢说真话,恐被戴上“右倾”帽子。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写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人加上多少劳力,地就给你多少产量。这就是说,当广大群众掌握了党的总路线的时候就会产生多么伟大的力量!人们从来也不敢想象的力量”^[1]。紧接着在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又登了一篇名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其中写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上又一件大喜事。我们热烈地向发射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同志们祝贺”^[1]。由此可看出,上级对下级说假话,搞“浮夸”的做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大加表扬,这就使“浮夸风”愈刮愈大。“浮夸风”造成的危害无法估量,最显著的危害就是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直至征了过头粮,致使我国农村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了全面的粮食紧张局面,一些农民得了浮肿病。

2.4 “干部特殊化风” “干部特殊化风”的第一个表现是干部们普遍多吃多占,补贴工分(农村当时实行劳动工分制)太多。公共食堂做好饭后,干部们先吃;生产队分东西,如粮食、瓜果、蔬菜、现金等时,干部们先分多分;干部们夜里开了会议以后,吃夜餐,其伙食丰盛。“干部特殊化风”的第二个表现是干部们普遍贪污浪费。1959年3月郑州会议结束以后,全国农村开始整风整社,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问题,结果发现全国的基层干部普遍贪污浪费。如湖北省麻城县(其是革命老区)于1959年3月23日~4月1日连续召开万人大会,讨论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粮食问题和算账、退赔问题,“二十九日仅仅半天的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好多生产队查起账来,对不上口。……生产队的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歧亭六队二十四名干部,有十九人共贪污二千四百元,五个没有贪污的都是不在家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最严重,他们说,贪污十几块钱的算是‘清白干部’,贪污一两百块的相当普遍,多的在千块以上。小队干部也有贪污行为,但不多,一般的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块,贪污的名目多得很: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只有两万一千个劳动力,却被生产队领去了二万三千个劳动力的工资。……此外,还有贪污存款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1]。

2.5 “强迫命令风” “强迫命令风”既是农村“五风”的一方面,又贯穿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之中。上级刮小队和社员的“共产风”时,理所当然地遭到小队和社员的反对,此时上级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逼着小队和社员交出生产资料和现金等;当群众不听从干部的瞎指挥时,干部也利用权力对群众进行强迫命令,迫使群众就范;当群众不满干部说假话,搞浮

夸时,干部就对群众进行压制,甚至打击报复;当群众对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表示不满时,干部更是打击报复,处处刁难。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干部瞎指挥,群众不服从;群众不服从,干部就搞强迫命令。各地比较普遍的办法是开‘整风会’,‘战地会’,反‘右倾保守’思想,搞‘辩论’,戴‘帽子’。群众怕整、怕战、怕反、怕辩、怕戴帽子,干部说什么,只好办什么”^[1]。

总之,农村的“五风”互相连贯,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共同对我国农村和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

3 农村“五风”的危害

3.1 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滑
大跃进时期,由于我国农村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加之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修交通、大搞深耕密植、大搞集体副业和大搞采矿等,而不是将工作重点放在正常的农业生产上,再加上“五风”盛行,最终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挫折。“五风”刮走了小队和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工具、劳力和钱款等,这就直接破坏了生产力,使小队和社员失去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许多生产队粗略地计算一下,‘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损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五十元左右,多的达到一百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全公社刮‘共产风’中农具损失的情况是:船损失百分之三十二,犁百分之二十三,耙百分之二十四,秒子百分之十六,卜碾百分之十八,水车百分之七”^[1]。另外,“五风”还使社员对人民公社心灰意冷,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哪有心思搞生产?哪有心思爱护公物?哪有心思提高工效?哪有心思细收细打”^[1]?如湖北省沔阳县的澎场公社,“一九五八年以前,是全县比较先进的公社,这几年,由于

风‘刮’的大,瞎指挥的多,垮下去了,变成了全县最落后的公社。该社三十三个生产队,没有一个不减产。……生产差,收入少,负债年年增加。全社没有一个队不负债”^[1]。

3.2 破坏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五风”的盛行,使干部由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变成了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也使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发生了误解。如湖北省沔阳县,“党群关系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严重影响了人民公社的巩固。‘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群众骂‘共产风’是‘臭炮’,骂干部是‘臭虫’。杨林尾公社党委会,一九五八年以前,在向花队办重点,向花队减产,后来搬到中心队办重点,中心队又减产。群众骂他们是秦雪梅(扫帚星),‘走到哪里败到哪里’……‘共产风’把人们都刮糊了,闹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认为‘一拉平’不分你我,就是社会主义。加上这两年生活比较困难,有些人就以为,共产党只喜欢穷不喜欢富,这真是天大的误解。刮‘共产风’给唯恐天下不乱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从中浑水摸鱼,贪污搞鬼,有些好干部也被拉下了水,有的整个基层组织给烂掉了”^[1]。

4 结语

“五风”盛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并破坏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因此,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政策,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停止了所谓的各种“大办”,彻底纠正了“五风”,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小队,且恢复了社员家庭的自留地,允许社员进行一些家庭副业生产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迅速从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侵袭中恢复过来。以史为鉴,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需明确方向,脚踏实地地开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72,143,393-396,86,365-367,45,47,176-177.
-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1.
- [3] 汪忠.普通高中生生物选课与学习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26.
- [4] 李富恒,朱祥春,王豫颖.植物生理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2):44-46.
- [5] 张志良,瞿伟菁,李小芳.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270.
- [6] 李合生.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32.
- [7] 赫再彬,苍晶,徐仲.植物生理学实验[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136.
- [8] 张志良,瞿伟菁.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260.
- [9] 高俊凤.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42.

(上接第1222页)

的放矢地完成教学目标。同时,由于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进一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评价的改革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自我完善,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 [1] 张治安,陈展宇,武志海,等.植物生理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J].安徽农业科学,2010,39(4):2510-2511.
- [2] 潘瑞炽.植物生理学[M].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
- [3] 金春玉,金英姬.怎样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医学教学模式[J].现代医药卫生,2008,24(5):790-791.